

第一篇 对象·方法

第一章 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建构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既不能急于求成，又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背靠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现实，鼓足理论创新的勇气，进行积极的探索，尤其是要为此多做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构建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难度很大，需要几代经济学家同心协力，长期研究，主要是由于这项“系统工程”的完成，受到以下三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的束缚。在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这一范式的主流地位已名存实亡，但由于近几年来对基本经济理论的批判多于创建，而传统范式的概念、范畴和方法又为大多数经济工作者所熟悉、掌握和运用，因此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二是我国市场经济形态的不成熟性和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时期。经济学是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科学，在不成熟的经济形态中，理论抽象与逻辑展开都比较困难。三是理论准备尚不充分。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综合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创建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将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工作。这项工作，首先应当从澄清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开始。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研究对象的科学论述

一、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

学科研究对象的确定，是该学科作为一门科学存在的基本条件，也是建构其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关于研究对象的理论的过程中，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实现了经济科学领域中的真正革命。

19世纪中叶，随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总体结构有了科学的认识，形成了由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组成的社会结构理论，并从中分离出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概念的形成，不仅使马克思对生产力诸要素的结合方式有了科学的认识，而且使他通过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分析，揭示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在继承发展古典政治经济学生产力思想的基础上，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社会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的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①“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②

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马克思的重大贡献，也是政治经济学史上的一次深刻革命。在马克思之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进行过长期的研究，但他们的研究抛开了生产的社会历史性质。重商主义把货币看做是财富，认为流通是财富的直接源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页，第11页。

泉，利润是从流通中产生的；因此，重商主义把商业资本和流通领域作为研究对象，但这仅仅是对经济表象的经验性描述，还谈不上是真正的科学研究。重农主义比重商主义前进了一步，把研究对象从流通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即以农业生产领域作为研究对象，断定纯产品（相当于剩余价值）来源于农业生产而不是流通领域，这与重商主义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为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奠定了基础。但是，重农主义者认为只有农业部门才是唯一创造财富的生产部门，才提供纯产品，只有农业劳动才是生产劳动，从而使他们的学说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古典经济学派又比重农学派大大前进了一步，不但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流通领域转入生产领域，而且毫无例外地把一切生产领域即整个国民经济的活动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他们把探讨“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①和确定国民财富在各阶级之间如何进行分配作为自己的任务，把政治经济学当做发财致富的科学，由此决定了他们不能透过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揭示出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了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质和内在发展规律。古典经济学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试图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门超阶级、超历史的纯理论的科学，把研究抽象的不具有任何特定社会内容的财富的生产、分配、消费的原则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刻意避免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

政治经济学史上，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上，有真知灼见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对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对象、任务及其历史发展，进行了严肃认真的科学探讨，他们的许多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对创建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6页。

二、物质生产的社会历史性质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物质生产。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物质生产，具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个人物质生产的社会性质。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单个的人摆脱了自然血缘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个人存在正是以迄今为止最发展的社会关系如商品交换、货币流通、信用制度、竞争等为前提和条件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总是个人在社会中进行的，单独的孤立的猎人或渔夫“应归入 18 世纪鲁滨逊故事的毫无想象力的虚构”^①。第二，社会生产具有历史性质。马克思认为，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是从生产的一切阶段或某几个阶段经过比较而抽取出来的共同标志、共同规定或共同点，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例如，任何生产都包含着主体和客体，即人和自然两个因素，这是生产的一般条件。但是，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在各个不同的特殊的历史阶段中，生产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结合方式又是各不相同的，例如封建制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就存在着本质差别。用一切生产所共有的一般条件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这里存在着生产一般、生产特殊、生产个别、生产总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差异。马克思的上述论断对创建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例如，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是一般，不同社会制度发展市场经济是特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则是个别等等。

政治经济学不是商品学或工艺学，它所研究的是物质生产或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就是经济形式。政治经济学研究财富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8 页。

产的特殊社会形式，这是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进一步具体的科学规定。然而，政治经济学是否只研究财富生产的社会形式而不涉及财富生产的物质内容呢？这是把握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马克思不仅区分了财富生产的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而且把财富的物质内容区分为物质内容本身和为生产关系（形式规定性）所规定的物质内容，并认为当财富的物质内容表现为这些生产关系（形式规定性）的物质承担者，如生产管理和劳动组织的社会方面时，就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所以在我看来，使用价值起着一种与在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中完全不同的重要作用”。^① 马克思的这些重要思想对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社会生产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社会生产是一个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环节的有机整体。马克思关于社会生产是一个有机整体的思想，是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又一科学规定。马克思认为：“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② 马克思在 1857～1858 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通过对生产与消费、生产与分配、生产与交换辩证关系的考察，提出了社会生产是一个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环节的社会生产有机体的科学论断，这是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揭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一个科学成果。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虽然也论述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但只看到它们的肤浅表象，或者把它们当做并列的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41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7 页。

目，或者把它们割裂开来，或者把它们的相互关系看做由个人的偶然的規定性来中介。马克思关于社会生产是一个有机整体的理论，对于开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打破“所有制决定论”的束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方式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把社会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贯思想。马克思一再重申自己的观点，指出《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本论》本身的结构和《资本论》三卷的副标题都可以说明这一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述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时提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①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主张把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确定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政治经济学研究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不能孤立、片面地考察生产关系，也不能空洞、抽象地谈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是马克思考察一定历史阶段上社会生产方式的出发点和基础。他正是通过对现实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具体研究，才科学地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内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9～490页，第492页。

机制。至于生产方式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一些专门研究马克思《资本论》最初手稿的学者认为，可以把马克思的观点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①：（1）一定的生产力决定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力既是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前提和基础，又是它的产物和结果。在一个现实的社会生产方式中，在某种既定的生产力基础上产生一定的生产技术方式，这种生产技术方式规定和制约着劳动的社会结合方式。（2）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又产生和形成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不仅生产出物质产品，而且不断地再生产出产品在其中生产出来的那种生产关系，因而也不断再生产出相应的分配关系。（3）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是通过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实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这三者之间的联系和作用机制表现为：生产力—生产方式（即生产技术方式和劳动的社会结合方式的整体）—生产关系；其中，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极之间的中介或媒介，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综合在一起，表现为完整的经济关系。

以上内容相互联系，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象理论的科学内核。那种把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归结为生产力，或者仅仅归结为以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为基础的生产关系的观点是不尽准确、全面和科学的。在《资本论》这部经济学巨著中，马克思不仅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而且也研究了许多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畴方面的内容，如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条件，两大部类之间的经济技术联系，生产社会化引起的生产集中，生产资本的技术构成等。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面考察，马克思才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发展、灭亡的

^①参阅汪水波著：《马克思黄金时代的理论结晶——〈资本论〉最初手稿的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0 页。

规律。创建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注重学习、运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上确立的科学理论与方法。

第二节 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批判

一、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危机^①

经济学的范式概念是从科学哲学的理论中衍化过来的。1962年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范式(Paradigm)概念并做了系统论述。库恩认为，范式是一门学科中一般研究人员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规定了他们共同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思维框架。范式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范式的形成标志着该门学科已具备了系统、完整的学说体系。当一门学科的原有范式越来越难以对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做出合理解释时，人们对原有的范式丧失信心，势必会导致该学科出现所谓的“范式危机”。范式危机的出现往往预示着本学科革命的即将到来。在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争论之后，一种新的理论学说将最终被大多数研究人员所接受，并成为一种新的范式。范式危机和范式转换是科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与库恩所界定的范式概念相一致，经济理论范式是指经济学科研究人员共同接受并使用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②经济学中的范式危机和范式转换是经济科学发展的重要环节和集中体现。

在批判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时，首先应当搞

^①程恩富教授等认为，中国理论经济学中存在着传统的“苏联范式”和近几年迅速流行的“美国范式”，这两种理论范式都面临着现实问题的巨大挑战。与其说范式危机是某一理论范式的危机，不如说是中国经济学面临的是各种“教条主义”经济理论范式的总危机。——参见程恩富、张建伟：《范式危机、问题意识与政治经济学革新》，《政治经济学的地位与作用学术研讨会入选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98年11月。

^②樊纲：“‘苏联范式’批判”，《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

清楚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与苏联范式的区别。马克思范式以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创造性地把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应用于经济研究，分析视野十分广阔，批判非常深刻，如同历史长镜头一般地对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进行宏观把握。马克思范式的鲜明理论特性集中表现在《资本论》中，透过《资本论》可以看到，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体系中贯穿着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它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研究对象，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极大地避免了理论研究分割和肢解经济过程的风险，虽然，由于历史和认识上的局限性，《资本论》的体系也不是“天衣无缝”的。^①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石，以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商品为始点范畴，剩余价值为基本范畴，资本为主体范畴，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资本积累论首尾呼应，从理论上再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的历史，达到了逻辑和历史的一致。马克思娴熟地运用商品、货币、资本、成本、价格、利润、供给、需求、竞争等经济范畴，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当事人即资本的人格代表——资本家的动机和行为做了深刻的剖析；而对生产当事人动机和行为的缜密剖析，正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严重缺乏的。马克思不仅指出了所有重要经济范畴的二重性——经济过程的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而且把自己首创的劳动二重性学说应用于对资本主义本质二重性的研究，沿着劳动二重性——商品和资本二重性——资本主义本质二重性这一辩证的思维顺序，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

^①张曙光教授认为，马克思关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及其相互关系的思想过分强调了生产的决定作用，严重忽略了交换在价值的转移、分配乃至剩余价值创造中的作用。“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说，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产之中，或者是由生产决定”(引自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导言》)，这样，马克思的流通理论仅仅局限于商品交换的狭小范围，排斥了对更广泛的流通——交易的研究，从而无法对人与人关系的全部问题提供解释。——张曙光著：《制度·主体·行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反思》，第32~33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的种种异化现象，向人们预示了未来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方向——每个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全社会自由发展之基础的自由人联合体，这种新的经济制度“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① 马克思范式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缜密分析，充满了对人的幸福的关怀，洋溢着人文和人道精神。马克思范式，尤其是他关于商品——市场经济一般的理论与方法，是创建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思想渊源。

与马克思范式不同，苏联范式则是综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初步设想和斯大林的经济理论而形成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这个体系的主要任务是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和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中实行计划经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尽管其中有不少科学成分，但总体上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其影响力已日渐衰竭。本书所讨论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危机，正是指苏联范式的危机，更确切地说是 50 年代初在斯大林主持下写成的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范式危机。

苏联范式源于苏联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1936 年，斯大林宣布在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与此相应，在经济管理体制上逐步形成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即斯大林模式。这种模式的基本经济特征是：（1）以公有制为全体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基本上被消灭，只剩下社会主义公有制。苏联法律仅仅允许集体农庄庄员和部分城市职工经营非常有限的个体副业，

^①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41 页，第 342 页。

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苏联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有两种形式，即国家所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国家所有制被看做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高级形式，而集体农庄所有制则被看成低级形式。（2）国家所有制的实现形式采取中央高度集权的国营企业形式。生产资料的经营权集中于中央政权，绝大多数企业都由中央直接管理，中央直接掌握企业的人事权、计划权、财政权和产品分配权。企业职工没有直接管理企业的权利，只有建议权、咨询权和缺乏切实保障的监督权。（3）经济体制是排斥、限制商品经济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对商品生产和流通加以多方限制。它认为，在国家所有制内部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商品货币关系只存在于生产资料的两种不同公有制之间以及国家与个人之间。社会主义商品的范围也仅限于个人消费品，生产资料由国家分配给企业，实行计划调拨，不进入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等要素市场也不存在。（4）计划和行政手段是管理经济的主要方法。国家对经济活动实行直接的计划管理，下达指令性的计划指标。这种指令性计划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执行的特点，企业如果破坏计划任务，政府可以追究行政责任直至法律责任。行政手段也是管理经济的主要方法，国家通过发布行政命令和行政决议，组织全国的经济活动。市场调节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被排斥在经济活动之外。经济学的苏联范式正是这种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上的反映。

苏联范式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所有制、基本经济规律、产品生产形式、分配规律、经济运行和经济调节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都做出了系统、规范的理论论证。直至改革开放前，这一范式作为“公理”一直不容置疑地统治着中国的经济学界。经济理论工作者只能在苏联范式所提供的框架和逻辑空间中对计划经济中的一些现象进行研究和解释。在20世纪30年代初到50年代，随着斯大林经济理论成为社会主义主流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沉闷守旧的空气中持续了

20 多年。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苏联开始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写了不少反思、修正、批判斯大林经济理论的著作。在我国，主要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入、沉闷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界活跃起来了，学术争鸣波澜叠起，学术著作大量发行，经济理论体系不断分化组合，各种流派正在萌发形成。在我国，对苏联范式的怀疑、批判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商品—市场经济理论、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等几方面。

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讨论

在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创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们深受斯大林观点的影响，把政治经济学看做是仅仅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批判了雅罗申柯关于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力的组织问题的观点以后，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这里包括：（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二）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三）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这一切共同构成政治经济学的对象”。^①在这里，生产关系是关键词。斯大林所说的生产关系是什么呢？第一，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中与生产力截然分开的那个部分。他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着极为严格的界限，批评了生产关系包括在生产力的组织中的观点。第二，生产关系也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亦即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斯大林实际上把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经济内容（主要是归属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斯大林在给生产关系下定义时，把生产资料所有制单独列出来，很容易在理论上把对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研究导入

^①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 1952 年版，第 58 页。

误区。斯大林的观点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几乎支配着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个经济理论界。许多经济理论工作者在进行生产关系的研究时，又往往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看成是不受生产力水平制约的先验结构，认为在所有制归属上越大越公越好，偏好追求通过生产关系的频繁变革来推动生产力发展。这不仅扭曲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经济学科应有的基本性质，窒息了这门学科的发展，而且也给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1953 年斯大林逝世后，前苏联东欧一些经济学家对斯大林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定义提出异议，批评他把生产力完全排除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之外，给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带来不良后果。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东欧经济学家解放了思想，注重于对现实经济矛盾的分析，普遍对传统教科书那种以规律排队、政策汇编、部门综合为特点的理论体系不满，也反对简单地抄袭和模仿《资本论》的范畴和逻辑。在兰格、布鲁斯等经济学家看来，社会主义经济学必须涉及经济技术和最优化问题，强调经济增长、经济效果、经济平衡和优化发展的重要性。^①

苏东经济学家对“苏联范式”的批评，起初并没有在我国引起多大反响。直到 50 年代中后期以来，由于我国实际经济工作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急于变革生产关系，追求所有制的不断升级，酿成了巨大灾难，部分理论工作者才开始反思我国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离开生产力发展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倾向。直接掀开这场讨论帷幕的是著名哲学家平心。^②平心等人认为，政治经济学不单是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科学，它同时需要研究生产力变化与发展的规律。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生

①杨建文：“国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演变概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集锦》。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②平心“论生产力性质”，《学术月刊》1959 年第 6 期；再论生产力性质”，《学术月刊》1959 年第 9 期；关于生产力性质几个问题的发言”，《学术月刊》1960 年第 12 期。

产力具有二重性即社会属性和物质技术属性，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力是物质技术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总和，具有自身相对独立的运动。组成生产力体系的，有人与物两组基本要素；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性质显然不是以物质技术条件作为主要标志，而是以特殊的社会属性作为主要标志。这里，有关生产力的社会属性的观点是平心的一大创见。平心认为，一定历史阶段劳动者的社会地位、生活面貌与精神机能，一般的劳动性质，生产的社会性质，劳动组织性质，生产资料使用的目的性与社会作用，生产力诸因素新陈代谢的特点以及生产力变化和发展的各种社会条件，所有这一切综合起来，规定着一定社会经济形态的生产力的社会属性。第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处于对立统一状态中，它们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是不容分割的。针对当时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平心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新的生产关系只能在生产力增长所容许的限度内对社会生产起促进作用，它不能逾越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水平和物质条件，使社会生产无限增长。第三，在每一个社会结构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既有相互矛盾的一面，也有相互照应的一面；生产力性质和生产关系性质经常发生对流和相互渗透的作用。因此，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系统一起来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能够使政治经济学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第四，恩格斯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定义中的生产，决不单指生产关系，还包括生产力。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不能排除生产力的结构与运动规律而专门研究生产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围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展开过多次讨论，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例如我国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认为，在生产关系之外去研究所有制问题，不过是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分割开来，就不可能科学地揭示社会经济规律。^①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建国以来我国所有制形式的不断升级是同斯

^①孙冶方：“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经济研究》1979年第8期。

大林的理论缺陷有关的，搞所有制升级的错误是同把所有制从生产关系中独立出来，作为整个生产关系的基础的观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①然而，由于实践和思想认识上的限制，理论界的研究始终未能从总体上撼动斯大林的观点。

随着讨论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把生产力排除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之外，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变成专门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如何优越的诠释学，缺乏解决现实经济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的能力，这是造成我国很长一段时期内经济科学与经济工作发生偏差、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许多经济学家认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认为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应当确立研究过程中的生产力标准，加强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能力和解决指导能力。

三、关于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的讨论

1952 年底，中国出版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文本，1954 年又出版了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从此，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特种商品经济论在我国迅速传播并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是，在 50 年代中期，一些经济学家即已发现斯大林特种商品经济论内存的矛盾，开始提出不同的观点。比较引人注意的有，孙冶方在《经济研究》1956 年第 6 期发表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提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非但不应该受到排斥，而且应该受到更大重视；南冰、索真在《经济研究》1957 年第 1 期发表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提出了国营企业之间交换的生产资料仍然是商品 顾准在《经济研究》1957 年第 3 期发表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不仅提出消费品的生产资料都是商品，而且倾向于经过价格的涨落来调节生产与流通；卓炯

^①吴敬琏：‘所有制’二题”，《群众论丛》1980 年第 3 期。